

● 洪仁善 著

战后日本的

汉字政策研究

本书运用语言文字功能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
对战后日本的当用汉字、
人名用汉字，
JIS汉字等汉字政策的演变轨迹，
从字种、
音训、
字体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主编：尚 侠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商務印書館

主编：尚侠

战后日本的汉字 政策研究

洪仁善 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洪仁善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7632-6

I. ①战… II. ①洪… III. ①汉字—政策—研究—日
本 IV. ①H12-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55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 尚侠

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研究

洪仁善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632-6

2011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8

定价: 24.00元

序

日本的汉字政策问题，是明治以来的日本政府、学界以及普通百姓关心的大课题。即使到了今天，日本也没有停止过改善汉字问题的议论。为了汉字在日语标记中的存在方式，长期以来日本不得不做出各种尝试，其结果也扩大了汉字的多样性。具体表现在训读的出现、熟字训的应用、国训的派生和国字的创制等方面。

从汉字派生出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与日语中的汉字混合标记；还有假名标记、送假名标记等，这些标记方式之间关联密切，它使日本的语言文字变得更为复杂。此外，日本行政机关的各种制度，也使汉字问题步履维艰。文部科学省与法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官厅的实行政策，因各自初衷而不同，有很强的独立性。各个省厅虽然多少意识到其彼此之间的存在，但是历来还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逻辑，推进了汉字政策。

日本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标记因素以及运用法则体系，加上政府内部对汉字政策的多样化理解与处理，使得这一语境进入学术领域具备了足够的理由和意义。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日本汉字政策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多侧面的考察成果。

洪仁善氏根据这样的情况，于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在尚侠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在相关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2005年来到东京学艺大学留学以后，又经一桥大学的石黑圭教授的介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研究室。我在早稻田大学成为接收教官，并进行了研究指导。洪氏在撰写论文过程

中，执着于原始资料的查找，通过考察历史事实，积累了正确的信息。此外，对大量的先行文献和论文的反复解读，深化了自己的研究。在令人惊叹的努力之下，以相对较短的期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一篇以战后的汉字政策史为中心，专业范围内着手于汉字的字种、音训及其用法、字体问题的研究，也是在宏观上把握整个汉字政策大局的一种尝试。

在下雪的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了洪氏的博士论文审查会。通过答辩程序，洪氏论文内容以及作为研究者的能力被认可，获得满票顺利通过答辩。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答辩会，目睹了中国老师们认真的指导方式。

一晃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出乎意料的是，当年的那篇论文如今已成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体现了日中两国对汉字认识的差异，也能解读到日本研究者未曾企及的层面。虽然成功地论述了战后日本汉字政策的整体情况，但是对个别事项的定位仍然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课题。我相信这也是洪氏既定的努力方向。

洪氏在撰写论文时，正好是我在文化审议会的国语分科会修订“常用汉字表”的时期，作为委员在参加审议时，我也参考了些许洪氏的对汉字政策的整体把握和个别汉字细微的论述。

洪氏虽然是中国入，但她不仅精通日语，而且韩语功底也很深。敦厚诚实的人品，与她的生活经历和与生俱来的天资有关。在此，我希望洪氏的艰辛和笃学的结果能广为人知，为汉字的将来作出一份贡献，而且希望洪氏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桥梁，在今后活跃于这一领域当中。

笹原宏之（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
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2011年3月25日 于日本东京都

目录

绪论 日本文化不可规避的他者	001
----------------------	-----

第一章 “汉字假名混合文体”的确立	021
-------------------------	-----

第一节 一个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023
-----------------------	-----

第二节 强化音训使用的背后	064
---------------------	-----

第三节 字体简体化的归宿	071
--------------------	-----

第四节 汉字地位的再认定	088
--------------------	-----

第二章 当用汉字的再讨论	101
--------------------	-----

第一节 汉字表性质的变化	102
--------------------	-----

第二节 音训政策的修正	133
-------------------	-----

第三节 三个机构与三种字体	142
---------------------	-----

第三章 表外汉字的字体问题 159

第一节 汉字使用范围的扩大 160

第二节 表外字体的规范问题 185

第四章 信息时代的汉字政策走向 215

第一节 “改订常用汉字表”的登场 216

第二节 “改订常用汉字表”的音训及用法 253

第三节 表内汉字的双重字体标准 258

第五章 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摭议 280

参考文献 302

附录 310

后记 315

绪论 日本文化不可规避的他者

一、汉字与日本古代文明

汉字是独立起源的文字。作为汉民族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结构复杂，呈四方形；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历史沿革绵延三四千年之久。在农耕文明时代，汉字是亚洲最为成熟的文字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概念，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形成了以朝鲜、日本、包括东南亚的越南在内的“汉字文化圈”。

由于古代文化的脚步落后于比邻的中国两千年左右，日本史前没有自己的文字。汉字对当时急需文字的日本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楷模。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的弥生时代，王莽时代的货币已经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东京和大阪出土的货币上便铸有“货泉”二字，这是迄今发现的日本最早的实物汉字记载。“根据《日本书记》记载，应神十六年，百济王仁赴日，皇太菟道稚郎子师从王仁，学习已于约2至3世纪传入日本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经典。《古语拾遗》也记述了大和朝廷初设‘藏部’，收藏包括汉字在内的官物。”^①

^①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借用汉字作为自己民族的文字标记，成为古代日本的一种必然选择。“出土文物证实了五六世纪用汉字标记日语的史实。从这一时期到奈良末期为止的四百年间，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内容都是用汉字记载的，可以说是汉字的一个专用时期。”^①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坚定地寻求汉字的日本化。从依靠标音解读汉字开始，逐渐过渡到使用表意的汉字，再到9世纪平安时代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出现，日本才历尽坎坷，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这种情形，同汉字在朝鲜半岛是并不完全相同的。“训民正音”的出现是15世纪中期的事情，这表明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汉字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仅要早于日本列岛，在程度上也较日本更强些。无论是平假名，还是片假名，都是借助汉字的笔画完成的，而且比“训民正音”出现的时间要早600年左右。

从汉字传入日本，到作为“汉字假名混合文体”的日语标记方式的出现，汉字的重要性丝毫未减，不但作为日本文字“不可规避的他者”，而且同时成为日本文化发展必须随时面对的一个存在。在近千年的使用实践中，汉字作为文化的使者，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与制约着日本的文化演进。汉字与日本的关系，曾引发了众所周知的、日本知识界的“同文同种”说。作为一种文化见解，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科学性又当别论，它所关注的“同文”问题，却委实看到了汉字与日本文字、日本文化的血缘关系。

汉字传播到日本，很有些中华文明的一个女儿远嫁他乡的味道。两千多年来，汉字面临的是全新的、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日本学习西方、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以后，汉字的命运便不再安宁

① [日]中田祝夫：『日本の漢字』，中公文庫2000年，第245頁。

了。这集中表现在近代以降日本对汉字的不同立场与政策上。关于这一点，日本学术界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著述，有些甚至带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如子安宣邦的《汉字论》、中田祝夫和林史典的《日本的汉字》等。

二、明治以降日本废除汉字的风潮

18 世纪前半叶，随着“兰学”的传播，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同时带来了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第一次冲击。从那以后“西力东渐”的大潮势不可挡，最终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运动的发生。

1868 年，日本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明治政权，并且开始推行全盘西化的国策。江户时代中期已然形成并发展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在明治始初即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态势。但是，由于相应的近代理论素养与思想准备的匮乏，日本人的骨子里依旧保留着本民族文化天下无双、尽善尽美的狭隘与偏执；除了“国学派”的思想主张与国家主义的文化立场，日本并未找到建设近代国家与民族精神的理性之路。

这种情形决定了日本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内容、总体规律与某些本质特征。一方面，日本人学习西方，建立了一半是西方一半是自己的文化模式；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需要 200 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另一方面，在始终以张扬自我文化的“绝对优越性”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同时，对于养育过日本传统文化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

评价与处理,则成为日本为了维护主观设定的民族文化的“纯粹性”而亟待解决的巨大课题。甚至可以认为,不仅是明治时代,百余年来,日本那些聪明的文化人,为了找到符合本民族根本利益的题解,可谓机关算尽。对此中国学者严绍璦曾指出过,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脱亚入欧论”和“亚细亚主义”,它们的核心都是为了处置“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为了重新评价已经渗入到日本社会无数层面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价值和作用问题。^①

明治时期日本废除汉字的风潮,便是这样的文化整合的必然产物。它的消长与绵延过程,相当深刻地透视出日本近代文化转型的诸多本质内容。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已经出现了要求文字改革的呼声。最早提出废除“国字”中的汉字的,是受到当时在长崎的美国传教士威廉的东方观与汉字观影响的德川幕府的幕臣前岛密。^②1866年12月,前岛密上书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建议国家的根本在于国民的教育,因此日本也应该像西方诸国一样,尽量采用简便的表音文字来教育国民、废除汉字的使用。

在明治维新前后那样一个思想活跃、激烈动荡的年代里,“废除汉字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引领改革大潮的一个存在,唤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目与积极响应。这一建议的核心有两个:其一,汉字是日本国家语言中“原始”与“野蛮”的“化石”。其二,使用汉字标记导致日本文明颓废不兴,衰败落后。就专业层面而言,这一理论主张是19世纪欧洲比较语言学的“进化论文字观”在日本

① 严绍璦:“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日本学论坛》2005年3、4期合刊,第13页。

② [日]平井昌夫:《国语国字の历史》,三元社1998年,第163页。

的翻版。择取这样一块他山之石，其意尽在从“汉字假名混合文体”中驱逐汉字、独树假名，使日本语臻于言文一致的境地。从文化视角来认识，前岛密及其追随者不但首开近代以诋过定罪的顽劣回报中国文化恩典的先河，而且是日本近代语言民族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前驱者。这位后来曾参与过日本近代邮电制度的创立、当过早稻田大学校长的知识分子，遂以率先向汉字发难，成为明治初期思想文化领域最为显赫的人物之一。

在使用假名和罗马字标记的短长被争论之前，出现了一种减少汉字的使用数量的主张。提出并倡导“限制汉字论”的，是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的基本观点与主要见解是，日本既然有假名文字，还在使用汉字确有不便之处。但是，古往今来举国的日常书写都是靠汉字完成的，所以废除汉字也有不便之处。时下马上废除汉字很难，要做也得找寻时机，袖手旁观、消极等待不行，从现在起可以渐渐迈出废除汉字的阶段性步伐，方法是写文章时尽量少用疑难字，只要不用疑难字，汉字的使用数量就能控制在 2000 字至 3000 字以内。

首先，可以看出“限制汉字论”与后来的割断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脱亚”主张，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这表明福泽谕吉的介入“国字”改革并非附庸风雅或即兴之举，而是他的思想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无论是废除汉字，还是消减汉字，显然都是站在同一文化立场上来讨论问题，所不同的其实最多是一种学养的差别而已。较之前岛密，福泽谕吉的见解不但少了一点狂热感，多了一点现实性，而且在技术操作上也趋于合理。所以后来虽不断有减少汉字便意味着妨碍自由地使用语言的不同声音出现，^①但是近代

① [日]井上哲次郎：「文字与教育的关系」，《東洋学芸雑誌》151号，第190页。

文字演进的历史规律表明，福泽谕吉仍不失为近代日本的精神领袖。

主张用简略英语取代国语的改革论，出现在 1872 年。代表人物之一是留学英国、后来成为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众说纷纭的改革提案中，这一派思辨诡异，在绝望于日语的路上走得最远。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是，无论面孔如何，为了尽早吸收欧洲启蒙主义知识，谋取国家独立，追求文明开化，主张洋学的知识分子在“统一语言”的前提下，于废除汉字或消减汉字方面取得了共识。^①他们认为即使汉字方便，但是为了学习汉字而浪费的时间也太多，导致人生没有时间学习更多有用的知识，所以必须赶快改良汉字。如果还在为学习汉字而浪费光阴，便很难与西方竞争，那样好比西方人穿着鞋跑，日本人穿着木屐跑一样。^②第二，倡导英语为大的诸多理由中，最主要的是英语较法语和德语易学又具有通用性，而且英美两国较法国和德国道德层次更高。应该说这些也并非是不负责任的门外之谈，而是接受西方教育或西方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某种现代意识的体现。然而，撞上了国民精神这样一件麻烦的事情，也便在本质上和时代脉搏上产生了错位。坊间有人因此批评道，放弃本国文字，主张用奇字新语来表现日语的人，纯粹是没有责任心。^③结局自然是不管你走到哪里，最终还是得停下来。

“假名标记论”最早在 1869 年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日本国语学家柳河春三灶认为假名可以独自胜任日本语言文字的标记，并建议在业内从速刊行独尊假名的报刊。三年以后，前岛密发行了《每日

① [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 页。

② [日]外山正一：「漢字を廃止すべし」，『東洋学芸雑誌』31 号，第 9 頁。

③ [日]清水卯三郎：「平假名説」，『明六雑誌』第 7 号，1964 年，第 9 頁。

平假名报纸》，率先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认为在片假名和平假名的标记上，如今掌握片假名的人不多，所以他主张用平假名来标记最为恰当。^①然而，这次关于离开汉字日本语到底是否还能成立的尝试，无疑只能在困顿与危机中运行。日本的“皮”、“侧”、“川”的训读完全一样，假如都用平假名来标记的话，必然会产生误解。不仅如此，人们还意识到，属于表音文字的英语，在标记中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不可能只写简易的文章，所以若只采用平假名标记，将导致日本语的表现力面临严峻的挑战。

纵使出师未捷，这一派却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军人敕诏》发布的1882年有三个文字团体相继成立，并于次年合三为一，推出民间最大的文字团体组织“假名会”。1884年以降的近20年间，该会通过“罗马字会”正式结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从“国字”中驱逐汉字的运动；废除汉字的主张铺天盖地地涌向《东京日日新闻》和《邮电报知》等主要铅字媒体，这也是假名标记论者的巅峰之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充斥于这些媒体的文字竟然是所谓的新式“音读式双音汉字新词”，而这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话语状况。

无论多么醉心于极端的欧化主义，其文章仍然是汉文训读文体。这里明显地反映出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心理，只是他们当时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而已。^②

上文提到的“罗马字会”成立于1884年，该组织以废除现行文字、改用罗马字标记为宗旨。实际上，“罗马字标记论”的最初登场，也是明治初期的事情。自1874年始，西周、外山正一、矢田部

① [日]清水卯三郎：「平假名説」，『明六雑誌』第7号，1964年，第10頁。

② [日]イ・ヨンスク：「『国語』という思想」，岩波書店2007年，第39頁。

良吉等学者，先后发表了《用西洋文字写国语之论》、《用罗马字标记日语说》等文章。他们意在向日本人说明，与汉字相比，罗马字只需知晓 26 个字母，儿童和妇女就能像男人一样读写，普通百姓也能读懂学者的文字，并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废除汉字，似乎只要用外国的优秀文字来标记日语，就像能给日本人换一套值得骄傲的服装一样。^①

那以后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大多是为了在日本推广罗马文字标记做一些普及性或基础性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对罗马字的逐步认可，在“罗马字会”成立前后，田中馆爱桔推出了日本式罗马字标记方式；《用罗马字写日语的方法》等论文，也为“罗马字标记论”者标示了这一新的里程。罗马字在日本有多种标记方式，广泛使用的是根据英语的音标，用罗马字置换假名的黑本式。1906 年“推广罗马字会”取代了“罗马字会”。但由于将黑本式定为标准的标记方式，所以后来主张日本式表示方式的那些人遂从该会中分离出来，并且在 1921 年成立了“日本罗马字会”。

还应提及的是“神代文字采用论”。关于神代文字说，最早提出者是镰仓时代为《日本书纪》作注的卜部怀贤。他在《释日本纪》中提出，汉字是在应神天皇时代传入的，而假名则是由神代文字演变而来的。尽管学界普遍认为，神代文字中的 47 个字母与古代复杂的假名使用是互相矛盾的，应为后人模仿五十音图或“伊吕波歌”的伪作。但是，由于关乎日本文字的起源，该说仍然成了明治时期文字改革的话题之一，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主张神代文字存在说者大有人在，一些人甚至杜撰出韩国的“训民正音”模仿了日本神代

① [日]西周：「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雜誌』第 1 号，第 7 頁。

文字的荒谬见解。1885年，有人在谈到依据对神代文字的修正所得的19个新国字时认为，如果用新国字表示日语，似如入随心所欲之境，而且能够适应语言的变化。新发现的文字比起日本固有的假名更加方便，更具优点，比起罗马字来也自有所长。^①

尽管如此，日本国语学界的主流仍然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神代文字。1903年，金泽庄三郎在《日本语法论》里详尽地论证了神代文字的结构以后，神代文字虚无论才成为定说。

明治四十五年间，上言的诸多改革方案沸沸扬扬、此起彼伏，使明治前20余年间殆无宁日；最终废除或消减汉字，为日本找到一种新的、符合社会转型需求的文字标记方式，大有志在必成之势，并且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潮流。然而，这种文化立场上惊人的一致性与义无反顾的特征，却未能使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界如愿以偿。进入明治的后半期，声嘶力竭的文化人由于无所作为而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国语改革运动也进入了低谷，停滞不前。这时，文部省为力挽狂澜而注入了一些政府行为，从而为这场风潮奠定了自下而上的走向。

受挫之余，偌大一个知识界如果说完全没有反省的能力，显然是不现实的。废除一直以来使用的文字，采用外国文字容易伤害民族情感。到当时为止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起到效果，说明这种民族感情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国家由这种感情支撑着。^②这种认识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使采用西方文字诸说走入困境的原因，但它不为日本的文化立场与民族感情所接受；至少是由于并不情愿因为接受了某种洋

① [日]平岩煊保：「日本文字论」，《六合雜誌》第51号，第86页。

② [日]井上哲次郎：「文字と教育の關係」，《東洋学芸雜誌》第151号，第189页。

东西而委屈了民族精神，这便是当时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一种具有左右力量的文化心态。

日本人将西方的文字作为一种舶来品加以抵制的同时，仍然绕不开汉字到底是否属于自己的问题。面对困境，一种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国字的改变不仅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甚至也会给道德伦理方面带来很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我国国民的道德基础是‘忠’与‘孝’，这种忠孝不仅存在于字音上，它也和字形一样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①可以看出，在这种微弱的反对废除汉字的声音里，同样充满了对汉字、汉文化作用的暧昧认识。字里行间的逻辑在于，汉字的要旨存在于形、音、义三要素中，离开字形、日语的音与义也会受到影响。

在这场风潮中处境微妙的文部省，既无以一纸公文解决日语标记的职能，也实在搞不懂究竟哪种标记方式才真正适合日本。除了力求与知识界保持同一步调外，明治后半期才先后出台了三项政策性举措，意在推动这场文字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

1900年，根据民间的假名论争的结果，文部省决定在小学基础教育中采用表音式假名（《小学校令施行规则第2号》）。1908年这一规定因反响不佳而废除，复又恢复了五十音图的使用。与此同时，还于此年的5月设立了临时假名调查委员会，并提出了《使用新假名的国语标记提案》，但这一提案也在半年后旋即收回。^②

设置国语调查机构的必要性，最早是由语言学家上田万年提出来的。1900年2月，参众两院向政府提交的《关于改良国学国字的

① [日]井上円了：『漢字不可廢論』（講演原稿），1900年，第31頁。

② [日]加藤彰彦：『日本語の文字・表記』，明治書院1989年，第35頁。